

## 介紹：保羅·威利斯《學作工》

何明修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在1977年出版了《學作工》一書，立即引發各領域學者的討論。基本上，《學作工》試圖接合了教育社會學、勞動社會學與文化研究，透過精緻的經驗資料證明，以回答「為何工人階級的小孩會得到工人階級的工作」，換言之，就是為何某些工人的子女會喪失了階級流動的機會。針對這個問題，傳統的解答方式是預設資本主義的結構封閉性，使得某一個群體的生命機會受到先天的限制。社會不平等的機制是具有再生產性的，使得相同的分配模型得以維持。除了這種結構決定論以外，另一種解答訴諸於意識型態，認為某一種的文化觀念約束了工人的不滿，避免他們採取集體行動以挑戰整個資本主義的體制。意識型態的作用使得從屬階級「誤認」了自己的利益，從而建構出一個順從的主體。在《學作工》一書中，威利斯對於這兩種既有的解釋途徑採取批判的立場，無論是結構決定論或意識型態論，都是排除了一個具有行動與認知能力的行動者。「行動者的回歸」(return of actor)是二十世紀後半期以來社會學的潮流，研究者越來越不能接受純粹結構主義的預設，要求將擁有主動能力的行動者視為一個關鍵的面向。《學作工》試圖解釋階級的再生產，威利斯所採取的策略即是重視這一群工人小孩的「選擇」，指出他們為何「自願地」放棄了階級向上流動的可能，主動地「學習」一套工人階級特有的「文化」。簡單地說，威利斯的答案是反對機械的複製論，認為階級結構的持續是涉及了行動者的學習與文化因素。

《學作工》一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學校民族誌的資料呈現，第二部分則是理論分析。在第一部分中，威利斯研究英國中部的Hamertown中學生，尤其是一群具有「反學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的學業表現不良的學生，即所謂的「小子」(the lads)。威利斯發現，這一群被學校認定為不良少年的學生其實都具有工人階級的家庭背景，他們挑戰學校權威的想法也與特定的階級文化相符合。與「小子」相對的即是另一群聽話、用功唸書的「耳洞」(the ear'oles)，他們通常具有中產階級的背景，是教師眼中的模範學生。根據威利斯的分析，「小子」在學校不斷地在進行某種挑戰權威的游擊戰，開教職員的玩笑、故意違背校園的紀律、破壞學校公物等。「小子」認為正規的學校生活是無聊的，他們渴望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所以經常學習成年工人階級的文化習慣，例如抽煙、喝酒、打工賺錢等。有趣的是，「小子」雖然看不起「耳洞」，但是他們也知道「耳洞」未來會有比較好的待遇、比較體面的工作。儘管如此，「小子」仍是拒絕進入這種中產階級的生涯規劃，在他們的觀念中，所有的工作都是沒有意義的、重覆的、沒有升遷機會的。因此，透過校園內的某種社會化過程，這一群未來的工人階級提早學會了「廠房文化」(shopfloor culture)，他們認為畢業後的體力勞動(manual labor)是「理所當然的」。

在第二部分中，威利斯提升討論的抽象層次，試圖建構一套資本主義的文化再生產理論。從第一部分的經驗資料中，一個可能的提問方式即是：工人的小孩是否有機會「識穿」(penetrate)整個資本主義的機制，從而改變自己的行為？不可否認地，「小子」的確洞察到壓迫性的資本主義教育篩選機制，他們有意識地拒絕成為這套遊戲規則的共犯，以學校順從來換取未來較「理想」的勞動力市

場位置。威利斯同時也指出，他們的「識穿」其實仍有限制，因為即使他們將資本主義的價值顛倒了，原有的評判標準仍是存在的。故意拒絕較體面的白領工作、主動接受充滿男子氣概的體力勞動，並沒有真正威脅了資本主義，反而使得這個體制能夠更順利運作。因此，威利斯反駁以往機械式的意識型態理論，認為錯誤意識的存在是使得行動者受騙、麻痺、喪失行動能力。《學作工》並不是要證明意識型態理論的錯誤，而是將行動者的共謀帶進來討論，提出一個更為精緻的文化支配理論。最後，關於學校的社會學研究，以往的馬克思主義者常片面地視學校的作用在於壓制、洗腦，以正當化階級社會的現實。這種功能觀點往往忽略了校園內部的反抗文化，低估了內部的衝突。在威利斯的研究中，反學校的文化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緊張，但是階級社會的結構卻正是奠基於這樣的對抗前提。因此，學校的確是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必要環節，但是階級鬥爭的因素卻不斷地在教育過程中出現，使得學校成為一個充滿衝突的場所。

上述的細膩經驗資料與理論論證就足證明《學作工》的重要性。在接下來的部分，本文要討論本書下列的四個面向影響，即教育社會學、文化研究、勞動社會學、民族誌的研究法。

### 一、教育社會學

在七〇年代以前，教育研究者接受了自從 John Dewey 以來的進步主義與自由主義的信念，認為教育是實現個人發展潛能的必要途徑，以使得個人有能力可以追求其生涯目標。早期學者重視教育機會均等的問題，因為現代工商社會需要高品質的人力資本，而確保基礎教育的開放性、平等性、普遍性，才能使得願意努力的人有機會可以出頭。到了七〇年代，批判的教育社會學家開始借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他們重新思考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教育機制。在 Bowles and Gintis(1976)看來，與其說教育體制是傳遞知識，不如說是在進行一種排除的功能。他們批判以往學者忽略了資本主義本身是一個不平等的階級社會，而教育體制正好是位於階級再生產的重要環節。同樣地，Althusser(1990: 174)也認為教育是屬於所謂的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專門負責資本主義階級關係的再生產。這些批判可以稱之為「教育再生產說」(theory of educational eproduction)，共同指出主流教育論述中的盲點。

然而，到底教育體制實際上是如何地滿足了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需要？七〇年代的批判學者並沒有提供答案，更嚴重地，他們似乎抱持著一個有問題的預設：受教者毫無能力抵抗由上而下的教育灌輸，而且教育的過程與結果完全符合了再生產的需要。事實上，整個學校教育被視為一種黑箱子，先前分析者沒有興趣討論其中的細微過程。在此，《學作工》及時地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威利斯具體地解答了再生產的過程是如何實踐。誠如 Aronowitz (1977: xii)所指出的，威利斯指出，學校課程因為「欺騙」了學生，而達成再生產的功能。事實上，教育再生產是涉及了當事者的反抗，由於「小子」主動地拒絕了中產階級的學校文化，他們才進入最不可欲的職業位置。因此，《學作工》成為教育社會學研究上的分水嶺，威利斯駁斥了原先粗糙的「教育再生產說」，以一種更具說服力的方式來討論資本主義與教育的問題。在《學作工》之後的另一篇文章，威利斯更擴大批評的對象。在他看來，Althusser, Bowles and Gintis, Bourdieu, Bernstein 等人都是將混淆了生產與再生產之差異，使得再生產過程中的「動態與衝突面向」消失了(Willis 1981: 49)。

### 二、文化研究

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文化的問題總是放在意識型態的脈絡之下來思

考。到底統治階級如何建構一套思想觀念，以確保其物質統治的基礎，成為意識形態研究的重點。Gramsci 提出了「霸權」(hegemony)的概念，將文化領域視為階級鬥爭的場所，不同的統治與反抗集團試圖提出一套道德與智識的領導權 (Gramsci 1971, 1992)。從意識形態到文化霸權，Gramsci 之後馬克思主義者更重視人為介入的面向，而反對直接將文化視為某種經濟結構的反映。就這一點而言，威利斯的研究是依循著 Gramsci 所提示的方向，探討資本主義的文憑主義、功績主義(meritocracy)、體力勞動與心智勞動之區分等文化如何在校園日常生活中被形塑。

此外，針對文化的具體過程，威利斯也特別重視行動者的主動性，「社會行動者並不是意識形態的被動承載者，而是積極的佔有者，透過鬥爭、衝突以及局部的看穿這些結構，他們才將現存結構再生產出來」(Willis 1977: 175)。在此，威利斯批判了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後者將意識形態的生產視為一個獨立的領域，所謂的主體只不過是被「呼喚出來」，只是結構作用的後果(Althusser 1969; Althusser and Balibar 1970)。如果這是正確的，那麼意識形態所建構出來的行動者必然堅信統治者的觀念，成為不會批判反思的順民。但是，誠如分析者所指出的，威利斯研究的重要啟示即是在於「社會秩序的再生產有可能是一種未意圖的後果，源自於拒絕了次級社會化的官方機構(即學校)所宣揚的價值與規範」(Thompson 1990: 89)。因此，文化領域存在著各種協商、挑戰、顛覆、嘲弄等可能性，而不是單面向的灌輸。

### 三、勞動研究

自從 Burawoy(1985)以來，勞動研究的核心問題即是工人如何自發性地接受資本主義所安排的秩序，而不是採取反抗的態度(謝國雄 1997)。Burawoy 認為，古典的「工廠專制主義」(factory despotism)已經成為過去，單純的「強制力」(coercion)是無法形塑一套生產秩序。要確保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勞動過程需要被重新組織，以達成工人的自願性順從。勞動者的意識問題重新被提出來了，到底工人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勞動處境，他們所具有的認知圖示又要如何被用來詮釋，成為了一個不忽略的面向。因此，一種可能採取的提問關鍵即在於工人文化，亦即是在日常生活中，工人們如何理解、實踐資本主義內部的對抗關係。

針對此，《學作工》其實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的解答，以釐清為何工人會接受現有的秩序安排。威利斯指出，反學校的青少年認同男性氣概，使得他們願意接受危險與骯髒的體力勞動。對於「小子」而言，體力勞動不見得是屬於「低等」的工作，而是其成年男子身份的必要證明。在威利斯看來，父權主義與資本主義具有某種的共謀，對於男子氣概的追求使得「學作工」更容易接受。

### 四、參與觀察與民族誌

隨著實證主義的典範在社會學喪失主導的優勢，各種質化研究的方法開始興起。在質化研究的風潮之中，參與觀察的研究獲得了重新的注意，而民族誌的寫作亦是受到相當的重視(Van Maanen 1988; Reinharz 1992: 46-75; Burawoy et al. 1991)。基本上，參與觀察研究法試圖掌握社會生活中的高度脈絡性格，而難以被標準化的面向。質化研究學者通常抱持社會建構論的預設，認為意義是透過行動者共同合作所創建出來。在他們看來，去除了脈絡的知識是空洞的，至多只能看到形式化、表面的層次，而無法掌握現實的社會過程。在社會學知識的生產方面，質化研究所理解的個案也不同于量化研究。民族誌的寫作者重視研究對象的整體性，並且試圖從其中梳理出具有普遍性的機制，而不是追求某種抽象律則。

威利斯本人也是民族誌復興的重要推手，他將參與觀察法從初民社會帶入當代的學校體制內(Willis 2000)。《學作工》的第一部分即是呈現了豐富的學校田野資料，威利斯是在1972-5年間開始與Hammertown的中學生接觸，一直追蹤到他們畢業後開始工作。威利斯從個別訪談、團體討論、學生作業等學生資料的收集以外，亦將教職員、家長視為是重要資訊的來源，成為了當代學校民族誌的先驅。

### 五、參考書目

- Althusser, Louis and Etienne Balibar, 1970, Reading Capital. London: Verso.
- Althusser, Louis, 1969, For Marx, London: Verso.
- , 1990, 《列寧與哲學》，杜章智譯。台北：遠流出版社。
- Aronowitz, Stanley, 1977, “Preface to the Morning Edition,” in Willis (1977).
- Bowles, S. and H. Gintis, 1976,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中譯本：《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教育改革與經濟生活的矛盾》，錦旭譯，台北：桂冠出版社(1989)。]
- Burawoy, Michael et al., 1991, Ethnography Unbound: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rawoy, Michael,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 1992, Prison Notebooks, vol.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einharz, Shulamit,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John B., 1990,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Maanen, John,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Willis, Paul, 197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 1981, “Cultural Production is Different from Cultural Reproduction...,” Interchange 12: 48-67.
- , 2000,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